

## 在“小器化”的时代里：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sup>1</sup>

### 1

最近 30 年全球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中国大陆的巨变。中国变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正在创造某种很难用现成的概念来概括的社会发展模式（即“所谓中国模式”）？中国依然是一个共产党集权的专制国家？..... 如何描述和理解中国的巨变，已经成为刺激和困扰全球思想界的一大问题。

中国人尤其直接地承受这个问题的重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它将走向何处？我该不该投资在这个项目上？我是不是要生一个孩子？社会状况这么糟糕，我们如何才能改变它？我应该放弃中国、移民去别的国家吗？.....要认真回答这些大小不等的问题，你都必须从思考“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开始。

1990 年代晚期开始兴起的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它的最重要的动力，就是要回答这个大问题，因为正是在 1990 年代晚期，这个大问题的重压表现得非常清晰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在大学里展开：先是东部和沿海地区（哈尔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口.....）的大学，然后是内地（武汉、重庆、西安.....）

---

<sup>1</sup> 本文是根据我在 2017 年 3 月 18 日于早稻田大学举行的“New Century: Questioning the Culture of East Asia Crossing of the Border”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稿修改而成。

的大学；大量学院式的工作持续推进：发表论文、出版丛书、开设课程、招收研究生、翻译外国（主要是西方的）的著作、建立研究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共识逐渐明确起来：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持续变化（其中很多是往坏的方面变），这提供了推动社会向好的方面转变的可能，因此，文化研究不能只做事后的分析，它应该介入现实——尽管清楚地知道，学院式的文化研究介入现实的力量是非常小的。

正是这个“应该介入现实”的意识，推动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者去大学之外开辟文化空间：市民论坛、工人读书会、网络电台、乡村文化建设.....<sup>2</sup>

这些活动反过来要求文化研究者更用力地去分析当代中国社会。

## 2

在这一节，我主要从社会再生产<sup>3</sup>的角度来描述今天的中国社会。

---

<sup>2</sup> 关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的大致状况，可参见我的《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中文版见《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英文版见 *Three Tough Questions of Cultural Studies, Creativity & Academic Activism*, edited by M. Morris & M Hjort, Duke U Press, 2012）

<sup>3</sup> 可以如此概括“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基本涵义：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此力量可以是某种实体，例如国家机器和政治团体，但更经常是表现为某种骨架式的结构或秩序）推动社会生活按照最有利于该力量的方向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再生产（human reproduction）是关键：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是普遍习惯于接受和顺应现实，社会生活就越能以有利于现存社会结构的方式顺利延续。

这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国家制度在形式上大体不变，但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约在 2000 年代初期，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结构基本成形，开始有力地牵引大陆中国的社会再生产。

可以将这个新的社会结构分为三个子系统，它们从各自的角度塑造大陆的中国人：

一是以“维持政治稳定”为第一目标的国家系统，党国（party-state）式的国家机器是这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它竭力驱迫中国人成为头脑灵活、顺应现实的公民。“头脑灵活”的意思是：知道自己遭受压迫和剥削，也常有强烈的不满，但深信政府和其他支配性力量（如市场制度和资本逻辑）非常强大，因此放弃反抗，甚至努力去迎合现实。

二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系统，这“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两个互相促进的方面：1，政府越来越自觉地像资本家那样思考和做事，政府直接管辖——或扶持——的大公司对市场有很大的垄断能力；2，资本逻辑不仅通行于经济领域，而且越来越深刻地支配公共管理、教育、婚姻、医疗、文化和娱乐生活，不断推高这些领域的市场化的程度；因此，这个系统相当有效地将中国人塑造为合乎其需要的劳动力和兴致勃勃的消费者；

三是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的生活系统，这个“居家”的主要涵义是：1，是都市式的：公寓、轿车、“中产”风格的家庭装潢……；2，是“去政治”的：不但远离公共政治，也尽量屏蔽劳资——或其他压迫性——关系的干扰；3，是以商品消费为第一媒介的；4，空间上是扩散的：去购物中心玩乐、去咖啡馆看书、去饭

店跟朋友吃饭、去东京的三越公司扫货、去澳门的赌场寻求刺激..... 都是“居家”。

最近 20 年来，这样的“居家”日益普遍地充当中国人的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做习题、考大学、进城打工、当公务员、做生意、贪赃枉法..... 如果问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做，十个人中有九个，给出的答案不出这“城市式居家”的范围。因此，这个系统正在非常有效地推动中国人往这个方向趋同：日益习惯于到物质消费中去体会自己的人生意义。

2000 年代初以来，这三个子系统的配合越来越顺畅：国家系统的“维稳”的强力运作<sup>4</sup>，给了政府充分的制度条件，让它可以将手伸进市场直接运作，促成有政府背景的大公司的市场垄断地位，既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国际国内的政治目的，也阻挡来自国际经济动荡的破坏作用.....；市场系统的持续膨胀和 GDP 的高速增长<sup>5</sup>，不但大大增强了政府的财力，也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明显提升了国家系统的正当性<sup>6</sup>；以“城市式居家”为核心的生活系统，一面从另外两个系统得到令自己快速成形的推动力<sup>7</sup>，一面也

---

<sup>4</sup> 这个运作得益于多方面的原因，除了来自另外两个子系统的支持（见下文），更有如下两点：1，党国通过限制非政府的组织和集体活动而形成的“一个屁股坐两个位子”（身为“国家”，却同时充任“社会”的骨架）的独大局面；2，以 1989 年“6·4”事件为标志的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所形成的对于民众的威慑作用。

<sup>5</sup> 这个高速增长明显得益于如下两个条件：1，长期——至少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百余年间——的经济发展滞后（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的匮乏）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低起点；2，1990 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聚焦于以金融、IT、尖端制造业和创意产业等为代表的高端领域，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则聚焦于中低端的制造业）。

<sup>6</sup> 市场系统所推动的民众（不只是中上阶层）物质消费水平和社会流动程度（尤其是 1980 年代晚期-2010 年代中期）的提高，明显扩大了民众对于国家系统的集权的容忍度；资本主义式的市场逻辑越是全面渗透非经济领域，民众越是习惯于从物质消费中体会人生意义，其对政治集权的接受和容忍度也越容易提高。

<sup>7</sup> 可以如此概括这些推动力：国家系统越是有效地限制民众涉足于社会公共领域（尤其是其中的公共政治领域），民众寻求人生意义的眼光就越容易往私人生活领域转移和集中；市场系统越是营造出物质消费的

以自身的有效运作，向中国人提供正面的生存意义<sup>8</sup>，减轻他们从另外两个系统承受的精神和生理压抑，令他们继续有意愿接受和顺应现实。

这些年，中国深陷各种严重的结构矛盾和社会失衡，也日益全面地遭遇来自国外的多种压力，却依然大体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上述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之间的有效配合，尤其是它们在合力改造中国人的心智结构这一方面的不断深入，显然起了关键的作用。

### 3

即便上面这样简略的介绍，也可以说明，新的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是很难分别用“政治”、“经济”和“文化”这样的词来概括的，它们每一个都同时兼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性质。因此，它们的越来越密切顺畅的协同运作，意味着它们是在合力——而且大体同时——确定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如果这一协同运作是持续而有效的，那就意味着，它们能将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内部——以及这些方面之间——的冲突，控制在比较低的程度上。这恰恰跟 1950-1970 年代的状况，以及 1980 年代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大

---

便利条件（例如遍及城乡的商业空间和支付宝之类的便捷支付手段），民众对私人生活的关注就容易落实在物质消费上面。显然，正是上述两个系统的强力运作，造就了民众只能向物质消费中去寻求人生意义的现实境遇，“城市式居家”的生活系统，也正是因此而获得快速成形的（对于社会再生产而言的）客观需要和实际可能。

<sup>8</sup> 其中最普遍地深入人心的一项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增加收入、尽可能多地享受物质生活的愉悦，跟这个事情相比，其他的生活内容都是次要、可以放弃或至少暂时放弃的。

陆社会的主要方面之内和之间的矛盾，都越来越难以调和，最终剧烈爆发，导致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方向的明显转变<sup>9</sup>。

从这个角度看，上述三个子系统当中，以“城市式居家”为核心的生活系统就特别值得关注。为什么这么说？这里粗略地说一下两个理由。

一，到目前为止，全球研究界对这个子系统的认识，明显不如对另外两个子系统的认识。这个缺失不补上，对中国大陆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特质，都很难获得有效的整体把握。

二，也更重要的，这个“城市式居家”的生活系统，既是中国大陆社会再生产之所以有效运行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暴露这个运行之难以为继的一个可能最醒目的领域。假定 GDP 导向的经济增长仍能以减速的方式继续维持一段时间（10-20 年？），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严重倾斜势必成为社会矛盾之呈现的焦点：人们越是习惯于从——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物质消费中体验人生的意义，在社会和生态基本条件（例如城市住房、食品安全、空气和淡水质量、医疗保障）方面的消费困境，就越会尖锐地暴露上述意义的虚幻。

---

<sup>9</sup> 整个 1950-60 年代，以国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主导趋势（可以用“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来概括它）为一边，以“社会主义激进文化政治”为另一边，形成了日趋尖锐的深刻矛盾，主要正是这个矛盾为 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从 1970 年代晚期到 1980 年代，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更形成了多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 1989 年的“6-4”运动的爆发和“改革”运动的转向。

今天的中国人并非都是头脑简单的经济动物，多数民众是因为能从消费性的日常生活中获得补偿，体会人生成功的意义，才听从他们在雇佣劳动和公共生活中形成的消极意识<sup>10</sup>的引导，安心地接受——甚至忍受——现实。如果上述这样的精神补偿大半消失了，如果“城市式居家”的日常生活反过来激发民众的切身的<sup>10</sup>不安和不满了，中国人是否还会继续这么平和顺从，现在这样的社会再生产能否顺利继续，都会成为大问号吧？

因此，深入分析“城市式居家”的生活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尤其是分析它如何向民众提供精神安慰和补偿，减轻和转化他们的各种负面的社会经验，就成为我们理解今日中国社会的特质及其可能的变化方向的一项关键的工作。

#### 4

这就要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支配性文化<sup>11</sup>及其生产体制了。

自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大陆，一种新的支配性文化迅速成形，它不但跟 1950-70 年代的支配性文化<sup>12</sup>截然不同，也跟

---

<sup>10</sup>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概括这种普遍的消极意识，但类似“现实非常稳固和强大，我们不可能改变它，只能去适应它”这样的“政治无意识”（此处借用 Frederic Jameson 的概念），无疑是这种消极意识的核心部分。本文第 4 节对此有进一步的分析。

<sup>11</sup> 虽然“支配性”和“主流”这两个形容词意思相近，但在中国大陆，人们常将政府及其媒体倡导和推行的意识形态/文化称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尽管在实际上，这套意识形态/文化并不为社会的多数人所信奉，因而并不真具有支配性：为了避免这种混淆，我才不用“主流”这个词，而改用“占支配地位”和“支配性”这样啰嗦的形容词。

<sup>12</sup> 那 30 年间日益流行的“毛泽东思想”，可以被视为其时的支配性文化的权威的思想代表。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兴起的新的文化潮流<sup>13</sup>有很大区别。

没有篇幅介绍这个新文化的基本内容，只说一点：这是一个复调的文化。

虽然其核心概念（如“小康”、“发展”和“与世界接轨”）大都涵义空洞和模糊，它却发展出一些普遍深入人心的观念：“生存是第一位的”、“竞争是社会关系的准则”、“财富和经济都是应该持续发展的”、“都市是先进的，乡村是落后的”.....

在这些高调的正面判断底下，它更有一些消极低调、但对人影响更深的观念：“理想有什么用？没用的！”、“将来关我什么事？现在过得好就行了”..... 这些低调观念当中，核心的一项是：“现实太强大，我们不可能改变它，只能去适应它”：即便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也有极多是这么想的。

因此，这个新文化的“复调”并非两个调门平分秋色，而是一面一底：其中的低调部分，正构成其高调部分的基石：因为丧失了改变世界的信心，看人看世就容易消极，正因为难以体会理想的魅力，就更觉得只有物质利益才真实。

---

<sup>13</sup> 10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了一个当时被称为“新时期”、以后又被称为“八十年代”的时期，它持续了 10 年左右，在 1990 年代初全面终止。在这段时期里，原有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并未完全消退，新的文化潮流迅猛兴起，但还来不及形成一种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占据支配地位的大致完整的文化，而只是表现为一种“思想文化的新潮”的形态。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1988 年 6 月中央电视台播放的 6 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可以被看成这个新思潮的代表性文本。

最近十年来，这个低调部分的影响力，明显形成了超过高调部分的趋势，新的支配性文化的整体的消极和阴暗意蕴，是更加触目了。

## 5

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初开始勃发的“市场经济改革”<sup>14</sup>，很快形成了一套也与“毛泽东时代”明显不同的新的文化生产体制，正是它的有效运行，造就了上述新文化迅猛成形和膨胀的势能。可以说，这个文化的“新”之所在，和其“支配”力的来源，主要就是它背后的这套生产体制。

1950-70年代的支配性的文化生产体制，是以国家机器为中枢的<sup>15</sup>，其运行的范围，主要是文化和政治领域，但1990年代中期开始成形的新的支配性的文化生产体制，它的基本结构和运行领域，都明显不同了。

1990年代以来社会变动的一大特点，是政治和文化领域非常沉闷、经济生活却异常活跃，几乎所有新的事物，都是在经济领域里先生成雏形，然后或快或慢地壮大，逐渐被官方认可<sup>16</sup>，进而得到传媒和学校教育的拥戴。

---

<sup>14</sup> 1990年代初勃发的“市场经济改革”，和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在基本内容上虽有部分（主要是经济政策方面）延续，但差别更大得多，因此，它们并非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而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或过程。

<sup>15</sup> 此处的国家机器主要指中共的各级部门（尤其是其宣传部门）、所有媒体和学校（19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所有媒体和绝大多数学校均为官办）、所有文化机构（如各级作家协会、文艺家联合会和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些机构无一例外均为政府机构，尽管有些名义上是“群众团体”）和共青团系统（其机构性质与作协、文联相同）。

<sup>16</sup> 官方的这种“认可”，通常都包含从官方立场展开的不同程度的修改。另外必须说明，官方并非都已这种方式“认可”非政治领域的新事物，也有不少这类的新事物，例如私人企业建立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就被政府以各种方式明确地消灭了。

正是这个特别的社会态势，给了持续变动的经济系统一种远远超出狭义经济范围的能量，许多新的经济规则、模式和制度，常常兼具明显的文化和政治功能，甚至直接发挥巨大的意识形态影响。1990年代迅速重建的房地产市场及其广告工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塑造人的价值观、商业头脑、生活方式、婚姻和家庭模式、代际交往关系、空间习性和就业意识……几乎所有这些方面，它的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是今天任何一个文化和政治系统都比不上的。它在改造社会阶层结构和官场政治生态方面的巨大作用，更是众所周知。

正因为这几十年来，“文化”和“政治”的许多重大事务，实际上都是由“经济”来规划的，当新的支配性的文化生产体制成形的時候，类似房地产市场和广告工业这样的系统，就自然占据了中心的位置<sup>17</sup>：它们不只是经济机器<sup>18</sup>，也是巨大的文化机器。

前面说过，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互相兼任的情形，最近二十年日益普遍，不仅是经济部门来做文化和政治的事，文化和政治部门也越来越普遍地做经济的事。正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中，新的支配性文化生产体制的运作越是有力量，就越会促进“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混同。当然，这混同并非随意结合，而是有其不容偏离的方向的：依循“市场经济”——即资本增值——的

---

<sup>17</sup> 以各级党的宣传部门为核心的政府文化管制部门，当然也是这个支配性的文化生产体制的重要环节（这是这个新体制从1950-70年代的旧体制中继承下来的主要部分），但在整个体制的运行中，政府管制部门的作用主要是限定性的，即确定和坚持政治禁忌的范围，而很少有力量参与——更不要说如在1950-70年代那样指导和组织——社会文化的生产过程，因此，其重要性是明显下降的。

<sup>18</sup> 此处的“机器”一词，借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里的“机器”(apparatus)的意思。

逻辑，将各种昔日各有自己一套脉络、甚至彼此不大相干的事物，重组为一个整体。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的支配性的文化生产体制，并不仅仅运行于一般所谓的“文化”领域。在许多时候，它像是跟在新的“市场经济”身后，随着这经济对于其他非经济事务的渗透蚕食，一步步扩大其运行的范围，直至囊括大部分文化乃至政治的领域<sup>19</sup>。

## 6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套文化生产体制运作最为成功的一个领域，就是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正是在这个领域里，这套体制以它对文化、经济和政治这三者之混合的全力推动，为前述的国家系统和市场系统布置了最合适的条件，以便它们合力创造一个相对软性、可以有效混淆和缝合社会矛盾的调节系统：这就是前面介绍过的“城市式居家”的生活系统。正是这个系统的诞生，完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总体结构的稳定成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个成形，对于当代中国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都是有近乎决定性的意义的。新的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也因此显示了它对在这个成形的深刻贡献，以及因此要对今日中国状况所负的重大责任。

不用说，这套文化生产机制所全力推进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的混同，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获得了最多样的、堪称充分的实现：不但几乎所有精神性的活动都越来越以消费为第一媒

---

<sup>19</sup> 今日官场的主流文化风气和官僚的大面积腐败，都是这方面的清楚的例证。

介，购物、置产和理财这样看上去只是经济性的私人事务，也日益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功能和人生寓意。主要正是经由这些混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相当迅速地取代狭义的文化领域，成为新的支配性文化的主产区，“城市式居家”的生活系统，随之构成新的支配性文化的一套一套覆盖面最广、渗透力也最强的发展方式。<sup>20</sup>

没有篇幅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了，这里非常粗略地说一下结论：

今天的中国的确非常令人——不只是中国人——困惑。既有以 GDP 为导向的经济的持续发展，1950-70 年代那样的普遍的物质贫困的明显改善，也有其他几乎所有方面的状况的恶化。即便是国人普遍自豪的物质生活的进步，情况其实也不乐观<sup>21</sup>。

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上述各节粗略介绍的情况：新的社会结构的三大子系统的协同配合、新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体制的有效运作、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延续，合力营造出一种功利至上的社会态势，威逼利诱，迫使中国人往崇拜竞争、不懂互助，看重物质、轻视精神，只关心自己、不在意他人，只盯住眼前、不多想未来的方向趋同，用传统的概

---

<sup>20</sup> 对于本段的这些过于概括的论述，我在《什么是今天中国的住房问题？》（中文版见《探索与争鸣》，上海，2016 年第 9 期；英文版见 *What Has the Housing Problem Shown about Today's China*, *Cultural Studies*, Rutledge, the 6th issue of 2017）中有较为具体的说明；刊发于《探索与争鸣》2016 年特刊的长篇调查报告《1990 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王晓明、罗小茗、郭春林、朱善杰和高明撰稿），则提供了这方面的较为细致的数据分析。另外还要说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这个改变，已经扩展到了越来越广阔的乡村地区，“城市式居家”的范围，因此不再局限于城市。

<sup>21</sup> 城市里新建的住宅楼密集如同森林，昔日水网密布的地区（例如浙江的很多地方）却普遍缺水，这个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目前这样的经济发展是如何一面消除过去那样的物质贫困，一面又制造新的可能更难消除的物质匮乏的。

念来说，就是持续、普遍地把中国人往“小器”的方向推。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三十年中国的“崛起”，我就觉得，GDP 导向的经济的增长，和社会之“小器”化的蔓延，可能是这个“崛起”的最重要的内容吧。

糟糕的是，不独中国一地是这样，“冷战”结束以后，全世界似乎也都在往“小器”的方向走。各地的“小器化”互相刺激和支持，形成了令人类生活整体往“利字当先”、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别的都丢开不管的野蛮方向持续堕落趋势。

中国人的“小器化”，当然有一部分正是受激于外部的变化；但相比起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社会的“小器化”对于整个世界的影晌，应该是更大的吧？

如果上述看法大体不错，如果社会和人心的“小器化”确实已经严重到了如此地步，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或者类似的思想、知识和社会介入活动，该如何应对呢？

这当然需要更多、也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这也不只是一件思考和研究的事情，它更需要大家挽起袖子、实地去干。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世界这么大，中国这么大，人类有了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即便现实强有力地逼迫人精神返祖，这逼迫本身，也会激起人的反感和忧虑，激发相反的意愿吧。这毕竟是一盘未定之局，我们向上进步还是向下沉沦，能不能打破这“小器化”的潮流，至少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怎么想、怎么做

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或类似这样的思想和知识活动，才显出了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人的希望之上的，它相信人应该有比在猪舍里满意地咂嘴——或者在丛林中惊惧地咆哮——体面得多的生活。

2017年8月 崇明